

宋

王
詩
集

集

卷

五



周抗

水
墨
海
集

王
羲
之
點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福州

求是论集

周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2,375印张 2插页 295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70

书号：2173·43 定价：1.45元

自序

这本小小的集子，我把它叫作《求是论集》。其中收入了从一九五三年冬我在华东局党校开始写理论文章以来的三十五篇作品。作为一个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和研究人员，我已经在这条坎坷的科学道路上度过了三十个春秋。我的这些作品，正好象一个登山运动员留在崎岖而陡峭的山径中的脚印，它们对于正在奋勇攀登的年轻同志们，或许会有点参考意义吧！

原先我并不是理论界的人。五十年前，当我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最初时期，我是属于艺术界的。一个艺术工作者怎么会转变为哲学工作者的呢？这是因为，艺术也好，哲学也好，它们对于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来说，都是思想武器；同时也因为，党组织根据革命的需要，对我作了定向的培养，而我则自觉地接受了党的培养并服从了党的分配。回想当年，当我最初拿起艺术武器去同反动派作战的时候，也就逐步地学起“新哲学”^①来了。我的第一本“新哲学”的启蒙读本，就是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而第一位“新哲学”的启蒙老师，则是戏剧家刘保罗同志。一九三七年秋末冬初，我在杭州加入了浙江流动剧团^②，从事抗日救亡的戏剧活动。从这时起，我在戏剧舞台上成

① 三十年代，一般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新哲学”。

② 浙江流动剧团，1937年8月成立于杭州，是党组织直接领导的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团体。

2184/05

了保罗的一个得力助手，而保罗则是在艺术、政治和哲学等多方面对我教育极深的一位良师益友。这位来自湖南的学徒出身的共产党人，自称是在“陆大”^①学的哲学。这位同志最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他总是从当时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地来给我和其他小青年进行政治和哲学的教育的。

那年十一月间，我们剧团从浙西转到浙东，先在绍兴一带演出了《芦沟桥》、《宝山中秋月》、《保险箱》等许多剧目，此后即向诸暨进发，一路上，我跟着保罗等同志，沿着从绍兴到诸暨的大路两侧，向农村散发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此就在到达诸暨枫桥时，遭到了国民党的扣留，后被软禁于该县的中心小学之中。当时我们全团六十余人，团结在刘保罗、邵荃麟等几位共产党人（秘密党员）的周围，同该地国民党党部头目傅××进行了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斗争。先是在诸暨，后派代表到杭州，斗争二十天之后，我们终于夺取了这场斗争的胜利。结果是获得了在诸暨县公开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法权利。于是，我们冒着日机连天轰炸的危险，每夜都在县民众教育馆的大礼堂里演出宣传抗战和统战的精彩剧目。热闹了一个星期，又转到南乡的陈蔡、斯宅等农村中再作广泛宣传，才离开了这个县而转向金华一带。

就在这场火热的斗争中，保罗给我进行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教育。他相当细致地阐述了关于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历史，指出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要求抗日，再加上党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决策。保罗特别

^① “陆大”即“陆军大学”，是曾在“浙江陆军监狱”中经受严酷锻炼的共产党人对这座监狱的一种称呼。刘保罗同志于1932年组织五月花剧社在杭州演出时被捕入陆军监狱，1937年出狱。

深刻地讲述了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联系当时我们亲身经历的这场斗争，他极有说服力地指出，团结统一的基础还是在于坚决的斗争。他认为，我们如果不敢对国民党方面进行这样一场严肃的，紧张的，合乎天理、人情的斗争，那么国民党的诸暨县党部也好，浙江省党部也好，他们才不会同我们流动剧团来讲什么团结，也不会让我们在诸暨城乡大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这是多么切实而又深刻的政治和哲学的教育啊！象这样令人难忘的理论上的教导，在我们相处一年多的时间里，还有许多次，这样就为我两年之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服从组织分配，进入政治教员训练班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创设了思想觉悟上和知识基础上的条件。一九三九年，我在太行山上经过了一年艰苦的理论训练，就服从了组织分配，被留在抗大担任政治教员，并连续教课三年。而这实际上是处在教学工作岗位上继续深入学习的三年。就在这一过程中，一面学打仗，一面在打仗的空隙中从事教课，一面又在打仗和教课的空隙中刻苦钻研了《实践论》、《矛盾论》、《帝国主义论》、《资本论》、《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列宁主义概论》等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于是才为我这样一个原来习惯于搞形象思维的年轻人转过来搞逻辑思维，甚至专搞哲学理论，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有时我说过自己是自学成才的，而这是不确切的。今天想想，应该说我是党组织培养成才的。在我的接受党培养的相当艰苦而终身难忘的岁月中，有许多象保罗那样的良师益友，是他们先后耐心地启发我、引导我，同他们一起，不但从书本里而且从实践中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些同志坚信，唯有真理，才能唤起民众，战胜敌人，克服一切困难，引向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这些同志还坚信，真理总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革命者

唯有沿着实事求是的路线去进行艰苦探索，才能找到真理。就是在这样一些同志的具体帮助下，才使我逐步养成实事求是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运用这个理论的习惯。并且，由于经过了一场由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起的全党整风运动，使我更进一步巩固了坚持实事求是学风的信念。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想，这本集子，特别是其中的某些文章，是颇能说明我三十年来坚持这个信念的情况的。

就拿一九六二年春天写的《评一个武断的〈决定〉》来谈一谈吧：这是针对着××班第×支部所作的《关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马俊芝的处理决定》而写出来的，我以中共中央第三中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的名义报给校党委的一份书面意见。事情是那样地明若观火，马俊芝同志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都在我领导下在华东局党校和第三中级党校的哲学教研室作教学工作。在这六年过程中，他相当努力，共写了七十余篇文章和讲稿。对他的这些讲稿和文章，从其中哪里找得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来呢？！可是马俊芝同志去学习进修过的那个××班第×支部竟然找出来了，并据此将马俊芝同志硬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然而这个所谓《决定》，一经我们核查，就立即显出原形。原来这些同志是采用了捕风捉影、片面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从马俊芝同志的那些文稿中和历次自我批评中以及听众对他讲课的反映中，任意断章取义、七拼八凑，凑成了马俊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据此不仅给他戴上了几顶大得吓人的帽子，而且竟提出了建议，要求原单位的党组织将他开除出党并开除出党的理论队伍！在这样一个武断的《决定》面前，我能不说老实话、不写一份实事求是的意见书吗？当时有同志竭力劝我不要写，还有同志批评我，“对一个党组织提出意见，竟采用这样尖刻的语言，是很不妥当的！”我都没有同意。然而就

因为这样一斗，一方面，马俊芝同志终于没有被开除出去；另一方面，我周抗就被看成是“右倾”，甚至后来被看成是“老右倾”了！！

在这里我还想谈谈一九六二年秋天写的《关于认识过程的几个问题》这篇演讲稿。这是依据刘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总结的“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联系上海和周围各省的一些实际情况，并结合上海的中级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而写出来的，对处长以上党员干部轮训班（第三期）作辅导报告的讲稿。当着作报告之前，又有几位同志竭力劝我，对某些问题不要讲，对某些问题要少讲，等等。当时我想，少奇同志的报告，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我为什么不可以联系实际，努力宣讲，以期多说服一些同志呢，在演讲中有什么好顾虑的呢？决心既定，我就大踏步地走上党校小礼堂的讲台，向听众耐心细致地分析情况，平心静气地探讨经验教训，一口气就讲了三个半小时。经过会后的讨论，我的这次演讲被轮训班学员及参加旁听的党校工作人员一致评为“起了用少奇同志报告的实事求是精神来统一轮训班学员思想的较好作用”。但是到了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我的刚刚被赞扬过的上述好报告就马上被某些人指责为“右倾”的坏报告了。等到三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起来，这个先被赞扬过后被指责过的报告，又立刻变成“周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当着造反派从马俊芝同志家里抄出他为我整理出来的报告底稿，他们迅即刷出批斗周抗的大字报。其内容是：

（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二）“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三）“放肆地攻击党的三面红旗”；（四）“攻击党‘骄者必败’、‘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五）“攻击大跃进带来了‘形而上学大发展’”；（六）“攻击党犯了路线性的错误”；（七）“攻击毛主席亲自发起的‘反右倾’是‘乱打棍子的过火斗争’”；如此等等。在这份大字报的煽动下，有一

部分于三年前对《关于认识过程的几个问题》也跟着别人喝过彩、叫过好的人，这时跟在造反派的屁股后边，也对我装出一副凶神恶煞似的可悲而又可笑的样子！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难道仅仅是使我个人遭了殃吗？不，它更使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遭到了严重的伤害！

当着“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内乱”宣告结束之后的最初几年里，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反实事求是的恶浊风气，这就是“凡是”论者的那种风气。这股风气，实质上同林彪的言必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一样，可以称为林彪遗风，或者也可叫作“文化大革命”的遗风。对这种现象，今天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可在当时，却大出我的意料。我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所写的《戳穿张春桥假冒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诡辩术》等九篇文章，不敢自吹水平有多高，我却自信学风都是正派的。可是为什么投遍了各编辑部，却没有一家肯发表呢？后来才知道，就是“凡是”论者在作怪。在上述九篇文章之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揭林彪一类偷换原则和另立标准的骗局》，这是一九七八年七月我在北京参加全国哲学工作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时的大会发言稿。我所揭发的是林彪之类十余年来经营着的这样一个大骗局，其内容的一个方面，叫做偷换原则，就是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偷换成抓片言只语，到处乱套，借以肢解理论并破坏实践的恶毒手法；其内容的另一方面，叫做另立标准，这是说他们从根本上抹煞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阴险地以“语录”作幌子，却抓住其中几句对自己有用的话，来冒充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以上述讲话稿的内容为基础，采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正面题目，来向上海人民揭发林彪的骗局并指出“凡是”论者的错误。记得是在八月中旬，我的演讲刚一开始，就惊动了上

海的一批“凡是”论者，其中在下面的立即打小报告，在上面的马上抓小辫子，如此上下配合，霎时流言四起，总之是对我大施压力。但是对于正确地宣讲真理标准，及时地揭发林彪骗局及其追随者的错误，首先就有许多老同志十分坚决地支持我，其次就是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以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高度热情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因此我没有被压服，从八月一直讲到十二月，到《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时候，我已连续演讲六十余场，直接的听众达十余万人，录音磁带上的听众更不计其数。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对上海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问题及时过问下，最后，这场斗争才以“凡是”论的失败和唯物论的胜利而告终。

从这本集子的许多文章中，读者都可以看出，我三十年来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不断遇到斗争的。这种为坚持实事求是而进行的斗争同我们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的过程完全相一致。正如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总算从曲折中走过去了，并且一定还要继续走下去，以期争取前途上的更大光明。我想，我在这条曲折道路上所作出的这点小小的成果，是可以告慰于四十四年前在苏北抗日战场上长眠地下的刘保罗同志的阴灵的。为了表示我将继续坚持在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前进的决心，特抄录在“林江之乱”末尾那个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所填《满江红——奉命赴上海师大看大字报》词一首^①，将它作为这篇自序的结尾。词曰：

① 1976年春，从“四人帮”特设的诬邓“窗口”——上海师大看大字报回来，心潮澎湃，夜填此词，曾在极少数同志中传阅。词中提到的“哀乐”是悼周恩来同志的；“群贤堂”是师大的大礼堂，“丽娃河”是师大校园里的河，因五十年前有“丽娃列旦”夜花园而得此名；《水从天上来》意指“出卖灵魂的老干部”的“狂想曲”；“经验妙，数第一”意指这里总结出来的“由上而下，层层施压力”的诬邓经验，曾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位登出，起了极恶劣的作用。

哀乐方过，亮出了刀枪剑戟。因何事，阴阳怪气，嚓嚓窃窃？群贤堂前风流子，丽娃河畔曾相识。弹一支《水从天上来》，卖身契！设窗口，诬“纳吉”；经验妙，数第一！嗟师生上当，假真难析。细雨扫墙撕破纸，微波迎面通声息。对天望，黑海万顷浪，从头拓！

作 者

目 录

关于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 (1954年12月)	(1)
论“迷信病”患者 (1956年6月7日)	(30)
论集体领导 (1957年2月21日)	(33)
谈谈个人主义问题 (1958年5月13日)	(40)
评一个武断的《决定》 (1962年5月)	(63)
论主观与客观 (1962年6月)	(82)
关于认识过程的几个问题 (1962年8月)	(94)
戳穿张春桥假冒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诡辩术 (1977年8月)	(133)
评假革命的反革命哲学 (1977年12月)	(139)
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的活标本 (1978年3月)	(147)
揭林彪一类偷换原则和另立标准的骗局 (1978年7月)	(163)
关于宣传真理标准问题答上海铁路局孙同志 (1978年9月)	(196)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始终不变的吗? (1979年2月)	(199)
再论客观真理没有阶级性 (1979年4月)	(209)
关于真理问题答山大同学的信 (1979年4月29日)	(222)
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实事求是 (1979年4月)	(224)

略论各个阶级共同的美（1979年6月25日）	(233)
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的榜样（1979年7月 19日）	(244)
答温致义同志（1980年1月2日）	(256)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问题答长沙工程兵学校 Y.F 同志（1980年2月20日）	(258)
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几种观点（1981年1月）	(26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纠正“左”的影响（1981年1月）	(277)
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1981年2月）	(292)
再论坚持毛泽东思想（1981年9月）	(303)
重读《实践论》的一点体会（1982年2月）	(317)
赞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82年2月）	(324)
在老解放区美术家座谈会上的发言（1981年7月11 日）	(328)
关于探讨人民内部阶级斗争问题的一些看法（1982年4 月19日）	(331)
有关人民内部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1982年5月）	(341)
论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83年1月）	(346)
正确理解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1983年1月）	(358)
关于研究方法问题答福建 Z.C.同志（1983年3月13 日）	(363)
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答贵州 C.C.H.同志（1983年7月 13日）	(366)
关于所谓“刘、邓资反路线”问题致庄振华同志（1983 年8月4日）	(372)
解放思想仍然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1983年7 月21日）	(379)

关于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斯大林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关于科学法则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法则的客观性质问题。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着重地批判了一种直接否认经济法则具有客观性质的错误观点。这种错误观点表现在某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法则是由苏维埃国家及其领导者所创造、改造出来的。按照他们的说法，苏维埃国家及其领导者既然可以创造科学法则，当然也就可以消灭科学法则了。这就是说，他们否认科学法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的反映。这种错误观点的危害性极其严重，他们既不承认客观规律性，因而也就否认了一切科学存在的必要，结果必然是以盲目领导去代替以科学为依据的正确领导。显然，这是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主观主义，是完全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也严格地批判了另一种错误观点，这就是否认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有些同志，他们似乎是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性质的，但是他们把法则偶像化，不主张人们去利用法则，反而让人们去做法则的奴隶。这种观点与前一种观点虽然各执一个极端，但却达到了取消领导这个一致的结论。前一种

人主张以盲目领导去代替科学领导，后一种人则主张放任自流，简直不要领导。由此可见，后一种观点同样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观点，它曲解了科学法则的客观性质，因而否认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这种错误观点也同样地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与批判上述错误观点的同时，斯大林从正面阐明和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自然法则和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以及利用这些法则为社会谋福利的原理。

斯大林的著作不仅是为了教育苏联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而且是为了教育正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世界各国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但是，我们应当怎样来学习它呢？我们应当持什么态度来研究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问题呢？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应当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的态度来进行学习和研究。这就是说，应当检查我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毛病，应当为了纠正自己的主观主义而去学习斯大林的著作，学习他所阐明和发挥的关于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的原理。

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把法则偶像化的观点并不显著，但是改造法则的错误公式也曾经流行过。除了书本以外，在我们实际的工作里面也还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主观主义观点。这种主观主义、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的观点，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严重的危害性的。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稳步前进”，这是进行各项革命工作时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之一。然而我们却常常不能正确地掌握这个原则，有些时候虽稳步而没有前进，另外一些时候则急于前进而忘了稳步。这是些什么偏向呢？前者是保守主义、自流等待的偏向，后者是盲动主义、急躁冒进的偏向。这些也就是斯大林所批判的两种偏向在我们这

里的具体表现。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自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有些人思想上滋长着一种骄傲情绪，夸大个人的作用，这种毛病要比斯大林所指出的那种夸大苏维埃政权的作用的毛病严重得多。犯这种毛病的人，虽然不一定会发出创造和消灭科学法则的议论来，可是很可能会做出妄图创造和消灭科学法则的事情来的。其结果是既危害了人民的事业，也葬送了自己。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一定要把自己周围，特别是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它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学习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问题，必须联系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毛病，加以揭发批判。只有不断地和主观主义及其他错误思想作斗争，我们的思想才能健康，我们才能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①的方法。

一、什么是客观规律性

斯大林指出：科学法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的反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科学法则并不是脱离客观外界而在人们脑子里面主观自生出来的。恰恰相反，它是人们对于自己头脑以外的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的认识（即反映），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假若对于客观过程的规律性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弄清楚科学法则的客观性质问题。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来研究客观过程的规律性问题。

自然界和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事物，因为它们并不是我们的头脑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以

^① 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页。

外，不依赖于我们的头脑而存在着的，所以称为客观事物。各种客观事物都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着的，这种变化、发展的过程就叫做客观过程。

那么什么叫做规律性呢？

简单地说，规律性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各种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任何一种事物都与其周围的事物有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可以分为外部联系与内部联系。外部联系就是偶然性联系，内部联系就是必然性联系。由于人们观察事物的次序总是由外而内，所以我们在说明内部联系之前，先说明外部联系。

偶然性联系，即外部联系，是并不一定如此的、在事物内部没有巩固基础的那种联系。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比方花园里有一棵小树，忽然折断了一根桠枝，经过了解，才知道是因为隔壁篮球场上的篮球偶然落进园里，打在这棵小树上了。再比方某同志天天都在规定时间以前到达办公室，有一天忽然迟到了五分钟，经他说明，才知道是因为在马路上偶然碰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多谈了几句话。显而易见，篮球并不一定会打在小树上，某同志并不一定会在某一天碰到他的老朋友，这种偶然性的现象都是偶然性联系所造成的。

必然性联系，即内部联系，与上述偶然性联系相反，是一定如此的或者迟早总要如此的、在事物内部具有巩固基础的那种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是一定如此的，所以它起着一定性的作用并且造成一般性的必然现象。这种联系对人们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它的一定性，即必然性，人们认识了它就可以利用它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自然界和社会上，早已为实践和科学研究所证明了的必然性联系的事例是非常之多的，下面我们就举出一些来说明：

大家都知道，汽油遇到一个火星就一定要爆发，汽车正是利